

“老大哥”监视着你吗？^[1]

——政府在监控与实施质量保障过程中的角色演变

贾米尔·萨尔米 张建新（译）

一、研究背景

法国哲学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充满怀旧地观察到，“困扰我们的麻烦事是未来将不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模式了”。此种现象是一股巨大的潮流，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突出。英国最近公开发表的一份报告使用“雪崩”一词，用于描述影响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的根本性变革。^[2]毫无疑问，裂变、危机与刺激这三个因素是挑战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变革的三股强大力量。

首先，不断增加的“裂变因素”在高等院校转型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大影响了高校教学与研究功能的正常运转。在这些裂变因素中最为抢眼的是技术创新，如交互学习的翻转课堂、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MOOCs）使得世界各地数千百万名学生受益匪浅。新型营利性企业大学提供的专业资格证书与劳动市场需求紧密相连的竞争形式，使得可用于衡量及比较全世界各大学绩效的全球大学排名等新型问责模式横空出世。^[3]

其次，由于2007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滑坡，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高等教育已惨遭“危机因素”的严重影响。例如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水平在各州都已大幅降低，2008—2013年美国50个州中有48个州都遭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联邦政府投资医疗保健等其他行业，却不愿拿出更多国家税收来支持教育。^[4]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欧洲大学协会（EUA）一直在密切关注高等教育发展势态。2008—2012年，欧洲65%的大学经费预算整体削减。^[5]发展中国家的经费削减更为严重，同时还伴随着家庭收入急剧下跌、毕业生失业率飙升的窘境。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个因素，即“刺激因素”。与削减经费的危机因素总体趋势不同，少数国家政府认为，高等院校的创新力与扩张增长率至关重要，应该得到额外资金与可用资源的支持，以便促进高等教育发展。针对于此，大多数国家的一揽子计划是以“卓越计划”的形式分拨给国家一流大学的建设，比如中国、丹麦、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与中国的台湾地区等。

在各种复杂、多重力量作用下，世界大部分地区高等教育入学率一直在迅速飙升。高等院校的扩张引起了人们对高校、特别是私立高校所提供专业质量的担忧，并给质量保障机构增加了更多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高等教育公共资金大大减少的情

况下，政府并没有降低他们对质量保障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的质量要求。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近年来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入侵”高等教育，对高校的问责要求也在显著增加。

在此背景下，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过去十年中各国政府、质量保障机构与高等院校之间相互作用的演变。首先，简要介绍质量保障历史进程。其次，描述最近几年政府与质量保障机构的角色演变、重大的发展进程、关键问题与面临的新挑战。这里并不打算从宏观的全球视角提供政府与质量保障机构之间发展趋势的详尽综述。再次，探讨大学排名、学习成果形式等新型问责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最后，论文提出了三个有助于政府与质量保障机构在自治与问责之间维持平衡的建议。

二、21 世纪初叶一场静悄悄的质量保障革命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的高等院校还拥有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强大外部质量保障传统的院校。由于没有设置国家政府高等教育部，质量保障职能基本上是通过私立认证机构完成。时至今日，此种模式仍然很流行。

这一切都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发生了静悄悄的变革。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国家开始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建立以政府认证为主要形式的质量保障机构。凡·达默（Van Damme）解释了这一时期许多国家质量保障迅速扩张至少有五个因素共同起作用。^[6] 第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阶段的转变，带来了人们对学术水平可能下降的担忧；第二，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全球经济活动中，雇主对高等院校能否保持同样的质量缺乏信心；第三，由于财政限制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但另一方面又要求高等教育对所使用的公共资源承担更大的责任；第四，在一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和不同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具体的质量保障措施显得尤为重要；第五，出于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利益相关者开始要求高等教育具有更大的透明度。例如，1983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第一个大学排名，回应了社会公众对公开更多高等院校绩效信息的要求。

欧洲见证了《博洛尼亚进程》的直接效果。《博洛尼亚进程》于 1999 年正式启动，其中一项最重要的举措便是所有参与国都建立或加强质量保障机制。其依据是 2003 年《柏林公报》发布的原则以及 2005 年由教育部长、高等教育部长卑尔根会议通过的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合会（ENQA）制定的标准指南。到 2008 年，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运行良好的评估或认证机构。欧洲质量保障注册局（EQAR）已经成为影响质量保障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望把国家体系融入第三方机构的标准指南中。国家与第三方机构质量保障标准的成功融合一直是博洛尼亚最引人注目的结果。

东欧与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一直积极参与这一进程。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家都已建立了质量保障体系，尽管各国质量保障能力参差不齐，许多机构仍不是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合会的正式成员。例如，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简称“波黑”）、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和斯洛伐克共和国都只是附属会员。

虽然到 21 世纪初，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正规的质量保障体系，但是在过去的 15 年里，质量保障运动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在拉丁美洲，第一个质量保障机构于 1991 年在墨西哥建立。两年后，哥伦比亚也建立了国家认证机构。随后 20 年间，该地区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国家质量保障机构。中美洲国家是一个例外，他们建立的是区域认证机构。今天，乌拉圭是该地区唯一一个没有建立正规质量保障与认证机构的国家，其教育部负责颁发许可证给新建的私立大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质量保障机构一直是以独立机构形式运转的，但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 3 个国家的政府一直对质量保障机构持有直接控制权。

亚洲与中东地区都经历了相似的演变。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率先于 1994 年建立了国家质量保障机构，随后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国家层面的质量保障机构。目前，缅甸是唯一一个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正规外部质量保障机构的国家。在阿拉伯世界，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见证了大多数国家建立质量保障体系的进程。2009 年，该地区 17 个主要国家中有 11 个建立了国家质量保障机构。随后也门成为第十二个国家。目前这一地区仅有 5 个国家还没有正式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其中黎巴嫩与突尼斯这两个国家的质量保障体系正处于初步创立的阶段。

非洲也许是质量保障运动开展最慢的地区。到 2006 年，非洲只有 6 个国家建立了全面的质量保障机构。加纳、尼日利亚与南非是质量保障领域的先驱领跑者，在过去八年中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发展至今，非洲总计有 23 个国家建立了国家层面的质量保障机构。最近泛非质量保障会议的闭幕宣言已经敦促所有还未建立质量保障体系的国家，把质量保障作为战略优先考虑事项，特别是在民办高等教育与电子学习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地区。^[7]

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当今各国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1. 先进体系。这类国家高等院校有着良好的内部质量保障过程，同时将提高质量的战略重点，与国家的外部质量保障或认证机构保持一致，质量保障往往与国家资格框架密切挂钩。经济发展较快的经合组织国家属于此类。2. 完善体系。这类国家仍然主要依靠外部质量保障机构，高等院校有较大一部分并不完全符合国家质量保障标准。许多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属于该范畴。3. 建立与巩固质量保障体系过程的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中亚转型国家属于该范畴。4. 尚未建立正式质量保障体系的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国家、中东、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等 20 多个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简要回顾质量保障现代历史可以看到，随着国家质量保障机构发展壮大的同时，质量保障运动在捐赠机构的推动下更多地呈现出国家间互动。^[8]首先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帮助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增强了认证能力，并于 2004 年诞生了第一个区域认证机构。该项目的前提是一个区域机构能够以更有效

的方式满足质量保障需要，而每个小国家不必都建立自己的认证组织，这样可以避免直接的利益冲突。目前，DAAD正按照类似的路径在西非地区建立质量保障机制。

其次，跨境教育的快速增长影响了公众对质量的信心。2003年至200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经合组织联手编著了《保障跨国界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针》，这是跨境教育项目所有利益相关者（政府、教育提供者、教师、学生、质量保障机构和专业协会）的行动指南。该文件为监控与提高跨境教育质量提供了良好运行体系与操作工具，从而保护学生免受低标准教育的危害。^[9]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加入了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这是美国专门负责高等教育机构认证的教育质量保障专业委员会，解决“文凭工厂”“认证工厂”等问题，揭发提供虚假文凭的高校。《2009年宣言》提供的指导性意见是要打击具有欺骗行为的质量保障机构。^[10]《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也进一步提醒会员国要警惕“文凭工厂”的现象。^[11]

再次，2002年出版的世界银行高等教育战略《构建知识社会》明确指出，质量保障是一项全球性的公益事业。全球化与无国界教育的发展影响所有国家高等教育，并且这种影响超出了任何一个政府的控制范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在谋求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寻求建立其高端人力资本的同时，造成了新的人才流失，损害了本国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不少国家缺乏一个适合国情的国际认证与资格框架，缺乏对外国高等教育提供者的法律许可……全球范围内虚拟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快速发展、跨境专业人才流动性的增加、许多发展中国家质量保障基础设施与能力的缺失，因此急需建立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最低共同标准的国际框架。^[12]

在此之后，世界银行拨出专项资金支持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INQAAHE）的发展。这是一个质量保障的国际联盟协会，旨在促进全世界质量保障区域组织的发展。该系列专项拨款首先帮助建立了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组织（APQN），其次是拉丁美洲教育质量保障组织（RIACES），再次是阿拉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ANQAHE）、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AfriQAN）和加勒比海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CANQATE）。这些专项资金均来自全球质量保障能力建设行动计划（GIQAC）。该计划由世界银行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管理，旨在巩固地区质量保障组织。最近，德国的合作项目与欧盟也在支持东盟质量保障组织（AQAN）。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围绕整个高等教育图景的重大变革并没出现太多的争论。相比之下，在治理与融资领域的改革，往往不是发生激烈的口舌之争，就是遇到学术界重重的阻力，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却被全世界所有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广泛接受。此现象可以用两大因素来解释。第一，高等教育体系变革的平衡，通常意味着更大的自治权与越来越依赖市场机制的调节，包括通过正规质量保障机制不断强化的问责制。^[13]第二，全球范围与地区层面的外部因素严重影响了国家与高校的行为。《博洛尼亚进程》已经在欧洲这个强大的载体中进展顺利，发展中国家区域质量保障组织

的出现也起到了强力催化剂的作用。此外，跨境教育的扩张需要在全球各地增强质量监管与质量保障。

三、质量保障最新趋势：政府角色转变

在对以上历史背景描述基础上，本部分从政府、质量保障机构与高等院校三者不断变化的关系出发，描述近年来质量保障的趋势。其目的不是为了详细描述世界各国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而是要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展现质量保障发展大趋势。

（一）增加审查

第一个重要的发展势态是质量保障紧缩政策，即采取更严格的规定，甚至关闭质量不达标和未通过质量认证的高校。这一趋势的产生往往是由于高等院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盈利和欺诈行为的出现，使人们对私立高校教育的供给质量产生怀疑。

拉丁美洲地区起步最早，在质量保障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问题。大多数国家最初选择了把重点放在专业认证而不是院校认证，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很难跟上专业快速发展的步伐，尤其是在私立高校。例如，哥伦比亚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被认证过的大学研究生课程不足 1%。2013 年认证院校的比例是 7%，认证专业的比例为 13%。有趣的是，获得较高评价的私立大学（13 所）从数量上超过公立高校（9 所）。^[14]直到 2011 年，哥斯达黎加只有 63 个认证专业，玻利维亚只有 74 个。

2012 年，厄瓜多尔政府关闭了 26 所被认证机构列为表现最差院校中的 14 所私立大学。同年，智利政府也因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差而关闭了一所私立大学——德尔玛大学。2014 年，哥伦比亚教育部关闭由圣马丁基金会开办的一所著名私立大学的几个医学专业，其原因是它们的教学质量差并且违背法律与税收规定。该国教育部正考虑对未公开曝光的其余几所大学采取同样的行动。表 3-1 显示全世界其它地方类似的案例，即东欧、非洲与东亚地区曝光的一些低质量高等教育机构或欺诈行为。

表 3-1 大学关闭的最新实例 ^[15]

国家	审查采取的行动	原因
阿尔巴尼亚	2014 年关闭 18 所大学	颁发假文凭
罗马尼亚	2013 年关闭 6 所大学，2014 年关闭 4 所大学	质量差
埃塞俄比亚	2011 年关闭 5 所大学，暂缓关闭 11 所大学	质量差
肯尼亚	2011 年关闭 100 所非法院校，可能会在 2014 年关闭所有非认证大学	缺乏举办授权、质量差
尼日利亚	关闭 9 所院校	缺乏举办授权、质量差
菲律宾	2011 年关闭国际工商学院	质量差

智利的情况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丑闻已经完全损害了该国质量认证的可信度。作为该地区多年来最先进的质量保障体系之一，智利认证委员会最近被指控存在利益冲突，缺乏独立性以及专业性不足。该委员会前执行主席和一位校长被指控欺诈与利

益冲突而入狱。同时，一项新的认证法案将提交国会通过，整个质量保障体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俄罗斯承认教育部的质量保障工作开展不力，政府已开始邀请检察机关监督公立大学的运作。预计未来一年将有 700 多所俄罗斯大学接受审核。

匈牙利近几年已经限制了质量保障机构的责任范围。成立于 1993 年的匈牙利质量保障机构于 2013 年失去欧洲质量保证联合会（ENQA）正式会员的身份，其原因是该国 2011 年新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使其在认证院校与专业方面仅扮演顾问角色，同时缺乏财政独立性。

荷兰于 2011 年公布的一份政府报告认为，现有的质量保障方法有缺陷。该报告还指出，如果发现大学董事会出现严重问题，教育部长应该有权向董事会发出警告。因此，政府决定加大教育督察的作用，从而可以部分削弱荷兰佛兰德鉴定机构这个官方认证组织的权威性。

波兰政府在 2011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修订）》中，把波兰认证委员会的工作重点由投入转向学生学习的产出，从国家立法规定的量化方法转变为定性方法。

东亚与韩国在加强质量保障方面的经验值得一提。2011 年，韩国在对 346 所私立院校进行全面评估后，其教育、科学与技术部取缔了低质量的私立院校，“点名批评”了 43 所高校并认定其为质量不合标准的院校。^[16]其结果是这些高校失去高达 1.43 亿美元的年度国家补贴，同时这些学校的学生失去了申请助学贷款资格。2012 年初，韩国有 36 所两年制学院因教育质量低而被禁止接收外国留学生。

同样，也门政府 2014 年决定停止资助到马来西亚私立院校学习的学生，主要是对“教育质量差、成本高”感到不满。^[17]目前，有 4,000 多名也门学生正在马来西亚私立大学学习。

土耳其政府新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提出 2014 年将给高等教育国家监管机构更多的权力，以保证博士学位项目的质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美国。2013 年底，参议院质疑认证机构的有效性，想了解各种认证机构是否监控严密。^[18]他们呼吁认证机构需要采用更严格的标准，提醒评审专家避免与评估高校之间发生潜在的利益冲突。

（二）质量保障结构与程序的巩固与变革

第二个相关的趋势是，为了促进质量保障功能的实现，质量保障结构与程序发生变革。这至少有五种表现形式：1. 从专业认证转变为院校认证；2. 强制性认证；3. 去中心化认证；4. 现有质量保障机构或部门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5. 强化质量保障机构的独立性。

一些国家的质量保障机构已经无法跟上培养项目快速增长的步伐，特别是私立院校的增长，于是这些国家开始提供院校认证作为质量保障的补充手段。例如，哥伦比亚已经在朝此方向努力，尽管该国大学获得认证的院校数量仍然很小。墨西哥私立大

学联盟（FIMPES）依靠院校认证确保其成员学校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中东与沙特高等教育部决定，2013 年要采取强制性认证而不是早先的自愿性行为。智利正在考虑在质量体系大变革中尝试采用相似的措施。

墨西哥按照美国分权认证的做法，已从直接认证系统转变为分散式的认证方法，即政府允许认证机构反过来对高等院校外部质量保障负责。自 2002 年以来，墨西哥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OPAES）已对认证机构与认证协会进行了认可，其基本标准是这些机构对自身使命的界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墨西哥虽然是拉丁美洲的国家，但其质量保障机制在该区域中却是最先进的，虽然其质量保证过程还吸纳了多种类型的保障举措。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是，一些已经有许多质量保障机构的国家努力理顺并巩固质量保障的监管结构。2012 年，爱尔兰决定将 4 个机构合并，成立“爱尔兰质量与资格委员会”（QQI），从而取代继续教育与培训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培训奖委员会、爱尔兰国家资格局并且行使爱尔兰大学质量理事会的职能。同样，奥地利 2014 年合并了早先负责大学与高等专科学校（理工学院）的独立质量保障机构，重新成立了一个国家质量保障机构。马来西亚的认证部门是附属于是高等教育部（国家认证委员会），最初是为了监管私立院校而专门设立的。后来建立了第二个质量保障部门——高等教育部质量保障署（QAD），以监管公立院校。2007 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带动各部门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部门，称为马来西亚国家学术鉴定局（MQA）。

质量保障机构合并主要是出现在资助体系直接设立在质量保障职能机构内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起到了高等教育联邦部的作用，也承担所有质量保障的职能。同样，尼泊尔大学资助委员会也负责质量保障。

最后，一些国家努力加强其质量保障机构的独立性。例如，克罗地亚政府 2009 年认识到该国于 2005 年建立的质量保障机构，即科学与高等教育局（ASHE），由于行动受到法律框架制约而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克罗地亚在新的《研究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法》中重新界定该机构的责任，使得科学与高等教育局成为克罗地亚唯一有资格履行外部质量保障职能的机构，并且成立了认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高等教育学者、学生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并且完全独立。

一些北欧国家，特别是丹麦与瑞典，在经历了摇摆不定的变化后，开始从一种强调高校层面质量改进的相对“放手”的系统转变为受到国家更多控制的专业认证机制。丹麦有两个质量保障机构，一个负责院校认证，另外一个负责交叉体系的认证。目前该国已经回归到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的质量保障机制，从而保证了高等院校具有更多的自主权。瑞典政府在 2011 年未曾与高校协商就强制建立了一个新式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即瑞典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SV）。结果，这个新兴的机构由于依赖政府而缺乏独立性，于 2012 年在欧洲地区惹了麻烦。欧洲质量保障组织批评瑞典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不遵守欧洲标准与指南，内部质量保障评估机制不公正等。^[19]

现在瑞典政府计划允许该机构更独立地开展院校认证工作。

法国新成立的研究与高等教育评估高级委员会（HCERES）将很快取代成立于2006年的国家科研及高等教育评估署（AERES），旨在增加法国大学的自治性，与2007年政府治理改革方向保持一致。法国研究与高等教育评估高级委员会只根据高校的要求开展大学评估与认证。^[20]

（三）筹集质量保障资金机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改变早先的高等院校公共资源资金分配机制，已经间接侵犯了质量保障机构的职责。例如，荷兰奖励学校的原则是毕业生按时完成学业。同样，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历届政府都迫使大学有效地完成毕业率定量指标。^[21]

美国依据绩效进行拨款的州已经从2010年的7个增加到33个。^[22]这些举措的主要目标是奖励那些努力提高学生完成高质量专业比例的高等院校。

同样，奥地利、智利、法国与西班牙的业绩契约允许大学在完成一些国家教育目标外获得额外的资金受益，包括质量改进、教育部与高校特殊目标的达成。

（四）放松管制

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收紧了质量保障结构、规则与程序，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当局选择放松管制，让质量保障机构发挥监督作用（如澳大利亚），甚至解除公共质量保障机构独有的评估或认证的功能（如英格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署（TEQSA）的作用与职责一直变化不定。2008年布拉德利高等教育报告建议成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监管机构，有权登记并关闭学校。遵照该报告的建议，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署接管并扩展了以前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AUQA）的职责，将州级与国家级质量保障机构的功能集于一身。但2013年，政府决定重返旧路，剥离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署的所有职能，并削减监管与质量保障的一半预算。^[23]这一变化表明，政府的意图是要减少对高等院校的监管负担，强调“风险性、必要性与均衡性”的工作原则。

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在2014年10月突然发表了一份声明，体现了政府向私营公司、慈善机构和政府机关开放一定权限的意图，使这些机构参与分担英国质量保障机构（QAA）的职能。^[24]这一声明出台的主要原因是，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高等教育，英国质量保障机构已无法应付频繁的评审需求，它已经变得过于宽松，其审查过程变得更程式化而非更有效。但是新成立的质量保障体系将如何组织、如何运行仍有待界定。

在此背景下，还应该注意，《2006年欧盟服务方针》指出，要保证任何欧洲国家公立与私立高等院校的自由，允许在欧盟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分校或拥有特许经营权，不允许侵犯国家质量保障机构的独立性。根据该《服务方针》，质量保障的主要责任不是在于跨境教育接收国的质量保障机构，而是在于提供跨国高校的那些国家。

中国台湾近来经历了相对温和的解除管制的过程。台湾教育当局决定于2012年向最可靠的大学授予“自我认证大学”的权力。此举是为了给大学增加更多的自治权，而教育当局有意帮助加强大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自我认证的大学必须要具有评估自身的能力并不断完善其审查标准。同时，这些学校有权自己组织外部评估而无需通过台湾高等质量保障机构——台湾高等教育评鉴中心（HEEACT）的事先审查。

（五）质量保障与创新

质量保障与认证体系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要找到保持质量标准与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创新两者之间的有效平衡点。最近印度、秘鲁与沙特阿拉伯三个国家的情况分别表明，严格的政府法规可以维持质量保障与创新之间的张力。

印度一些高校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开设4年制本科学位项目，不同于英国传统的3年制学位项目。^[25]做出改变的高校是德里大学、几所印度技术学院（IITs）、印度科学研究所以及几所私立大学。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通过调整使学位项目接近美国的学位项目，随后开放美国大学双学位项目，给学生提供在本科学习期间获得研究技能的机会。然而，印度的主要监管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是一个理想化变革。相反，2014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命令所有实施本科4年制的高校改弦易辙，回到3年制学位。有关高校认为4年制符合国际潮流，曾试图通过法院或请人力资源部部长干预其主张。这种行动可能会迫使印度最优秀的学生不愿选择科学的职业，进而威胁到高等教育的创新力，因此是需要彻底改变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实验必须得到鼓励，特别是在印度一流的高校里。只有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后，才会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印度技术学院的预算直接来自中央政府，而不是来自大学拨款委员会。它们也认为，大学拨款委员会没有学术事务的管辖权。但大学拨款委员会是否会转变立场却值得怀疑。

几十年来，秘鲁高等教育体系一直是拉丁美洲国家中最规范的体系。国家委员会负责审批新建大学，当大学校长与前任校长可能难以保持完全客观、独立的时候，可以重新授权一位私立院校的竞争对手。为了减少此体系固有的利益冲突与风险，秘鲁政府于2014年出台了新的《高等教育法》，成立了一个较为独立的专业管理机构，在一定年度中负责授权经营新建大学。然而，该法律也有一些限制性条款，似乎与虚拟教育与远程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同步。例如，理事会成员必须拥有博士学位，但不能是在线教育的学位。同样，通过在线教育获得学位的博士没有资格成为公立或私立的大学校长、院长甚至教授。法律禁止给少于50%的面授课程或学程少于5年的继续教育课程授予本科学位，规定5年学程才相当于普通全日制本科的同等学力。成功开创了秘鲁创新虚拟教育与继续教育专业的私立大学认为，政治与商业利益影响法律的起草工作。无论情况是否属实，事实上，这些条款反对在线教育的做法，违背了目前的高等教育的传递方式的变化，当今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s）风起云涌的发展已经席卷全球。

值得一提的是沙特阿拉伯。当该国政府把认证定为强制性而不是自愿性时，就已经决定了它不会承认一些专业获得的国际认证，如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的工程认证。通过强迫这些专业通过国家认证的过程，教育部向更具创新性的大学发出负面信息，即它们需要主动申请接受国际认证机构的审查。

更普遍的情况是，许多国家的大学都在抱怨评估与认证程序已经变得官僚与繁琐，以至于很可能演变为一个仪式过程。评估与认证程序对于专业与教育教学实践质量的增值不大，过分注重形式规则，淡化质量提高的过程等。有实例表明，阿根廷、澳大利亚、荷兰与英国等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且费用不菲的审查程序，却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对学校有意义的改进指南。澳大利亚评估机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署在最近提供的一份报告中承认，每年州级与联邦级议会与政府要求提供许多报告，呼吁“减少过度的、扼杀大学的官僚程序”迫在眉睫。^[26]早在2008年，彼得·威廉姆斯（Peter Williams）作为欧洲质量保障组织的主席就观察到，许多质量保障部门都专注其过程而不是把重心放到质量提升目的上。他把此现象描述为“僵化的质量保障”。^[27]表3-2总结了政府、质量保障机构与高等院校三者关系之间最显著的变化。

表 3-2 近年来政府的干预类型

政府干预型国家类型	国家实例
1. 在教育部或政府监管机构建立一个质量保障署	文莱（2011年）、老挝（2008年）、尼泊尔（2007年）、越南（2004年）
2. 建立独立的质量保障机构	厄瓜多尔（2011年）、希腊（2005年）
3. 多个质量保障机构的合并	澳大利亚（2008年）、奥地利（2014年）、爱尔兰（2011年）
4. 更严格的质量保障标准与要求	智利（审查）、荷兰（2011年）、土耳其（2014年）
5. 把认证变为强制性而非自愿性	沙地阿拉伯（2013年）
6. 关闭低质量的大学，取消低质量的专业	哥伦比亚（2014年）、厄瓜多尔（2012年）、罗马尼亚（2012年）
7. 优劣度的评比与点名批评或削减国家补贴	韩国（2011年）
8. 过度官僚化	阿根廷、澳大利亚、英国、荷兰
9. 利用资金机制影响质量	奥地利、智利、法国、魁北克、美国许多州
10. 创新实践障碍	印度（2014年）、秘鲁（2014年）
11. 放松管制	澳大利亚（2013年）、英国（2014年）

四、高等教育问责的新范式

命令之下创作不出名著，同样挟持之下也不可能有精彩的教学。然而，承认这一点就是给学术界找借口，使得质量保障专业机构不知不觉中陷入自满的习惯、自恋的质量标准、自我服务的行为准则。针对此种现象，很有必要对大学的社会责任与社会

各界展开一个持续的、激烈的论辩。^[28]

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高等教育问责的新方法,还有一些正在探讨中。^[29]这有可能影响到国家质量保障机构的工作,还可能完善现有衡量高等院校运行绩效的信息库。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以下5方面:1.学生参与调查;2.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3.劳动力市场观测;4.大学排名;5.基准评估。

(一) 学生参与调查

美国2000年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全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许多国家已经仿照它制定并实施本国的版本,调查学生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的教学与学习质量。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爱尔兰、荷兰与英国都定期开展了学生调查。最近几年,试点调查也已经在中国、南非等不同国家与地区展开。

20世纪60年代,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开始出现并持续不断,学生参与调查不仅包括满意度水平等主观指标,也包括衡量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与协作学习活动等客观维度。^[30]在学生定期参与调查的国家里,高中毕业生往往更容易选择他们想上的学院或大学。自愿参加学生调查的高等院校可用其结果达到质量改进的目的。

学生参与调查面临两大挑战:^[31]第一,学生自我报告数据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容易受到质疑。让学生报告其学习成果时,学生能否具有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如何选择并确定学生学习、学校教育标准、学生行为规范的关键因素?^[32]第二,这些调查意味着什么?并非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愿意选择公开调查结果。例如,美国许多大学,包括顶级大学,一直拒绝公布全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的调查结果。^[33]

(二) 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

与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不同,高等教育界还未曾拥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性的学习成果测量方法。然而,最近几年出现了令人可喜的举措。美国越来越多的机构已经使用三种评估工具来衡量本科层次的教育增值:1.美国大学考试中心(ACT)的大学英语学术能力评估(CAAP);2.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的能力透视测试(EPP);3.美国大学学习评估(CLA)。类似的工具还有澳大利亚的毕业生技能水平评估(GSA)。

巴西和哥伦比亚等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也率先尝试测量本科学生的知识习得与能力。例如巴西前联邦教育部长保罗·雷纳托(Paulo Renato)1996年开始将大学教育质量评估测试(Provão)作为一个自愿性测试,旨在比较全国所有大学相似专业的绩效。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评估体系。大学教育质量评估测试由大学本科生最终课程考试组成,不计入学生的毕业成绩,但是被用来评价高校与专业。2004年一项新的测试——全国学生成绩考试(ENADE)代替了大学教育质量评估测试。每3年测量一群学生样本,第一年与最后一年本科生的考试成绩作为测量本科专业的教育增值。^[34]同样,哥伦比亚评估研究所自2009年以来,实施了两次测试,衡量本科学生在开始学业以及学业结束时的能力。

在另外一些国家,政策制定者考虑利用学生学习成果达到质量保障的目的。但这

些建议已经引起了高等教育界的警惕，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即美国教育部部长“斯佩林斯委员会”）2006年报告描述了这一公开辩论。该报告建议通过测量学习成果来补充现有的认证系统。“……根据法律规定，学生的学习是认证的一个核心部分。不幸的是，学生往往是最不知情的，也是最后才被纳入视线的。学习认证仍然是最鲜为人知的部分，是高等教育最不透明的部分，甚至可以和拜占庭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援助制度有一拼”。^[35]

衡量学生国际化学习成果的举措也受到了冷遇。2012年，经合组织开展了“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价”（AHELO）试点项目，用于考察经济与工程领域学生通用技能和学科专业知识的成果。虽然17个国家参与了可行性研究及试点工作，然而项目未来作为全球大学排名的一种替代，其结果仍然有待观察。^[36]

私营公司专门从事测试工作的年轻毕业生近期准备扭转乾坤，引入一种新式的学生学习效果评价。例如，印度一些大型跨国企业让所有感兴趣的申请工作者都参加一个专业测试。印度有超过150万人参加了被称为“有志者计算机适应测试”（AMCAT）。英国的评估测试能力、定量分析能力与逻辑能力……还包括各种情景与判断测试，仔细观察他们的人格类型，看他们在特定领域如何应用其软技能。^[37]

（三）劳动力市场观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建立了劳动力市场观测（LMOs）。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建立了就业观测，如欧盟就业观测属于超国家层面的例子，美国劳工统计局、意大利阿尔玛大学观测都属于国家层面，在国家层面之下的有威尔士学习与技能观测、法国时报观察、佛罗里达州教育就业信息系统等。保加利亚、智利与哥伦比亚的实践都值得宣传。

自2012年以来，保加利亚政府已经发布了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结果的详细数据。使用来自国家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大学生统计资料，教育部能够提供最近5年大学毕业生的薪酬水平和工作类型的丰富信息。例如，数据库显示毕业生是否找到了工作、工作岗位是否对应其学习领域及水平、他们的雇主属于什么类型、毕业生有永久性还是临时工作、其工资水平是否基于社会保险缴款。

在智利教育部支持下，由阿道夫·阿多尔弗私立大学和智利工业工程部门大学联手，未来劳工部志在使年轻人受到学术教育，并具备职业能力。未来劳工部为毕业生提供数百个就业状况信息，几乎涵盖了75%的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向公众提供详细的数据信息，包括工资与就业机会。门户网站显示，各高等院校的各个专业、辍学率、平均获取学位的时间、4年毕业后的平均收入、本专业当前的学费、本专业的认证状态等详细信息。就业与收入的数据并不是自动公布的，而是来自国家税收局的权威数据库。高等院校需要提供与毕业生数据库相匹配的收益信息。信息隐私受到保护，因为税收服务仅仅公布各高校各专业的平均值，只要某专业或某高校有25个人就可以获得其收入数据。

哥伦比亚教育劳工观测成立于 2005 年, 由该国教育部管理。它收集并公布毕业生的需求与供给信息。学生、家庭、高等院校、研究人员与生产部门可以获得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学术水平统计数据, 包括他们领取的工资、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时间以及他们所工作的城市。网站成为学生选择职业时最便利的工具, 也成为了高等院校根据劳动市场的需求更新或调整专业设置的工具。哥伦比亚毕业生网站提供哥伦比亚与其他国家工作机会的链接, 还提供如何撰写并呈现优秀简历的建议与技巧。访客能够找到毕业生与雇主的调查结果, 还能看到特定学科与经济领域的研究。

这三项举措表明, 劳动力市场的观测旨在提供与个人的职业期望、高等教育背景和职业发展趋势相关的、更准确的知识与机会, 能够帮助明晰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度。

(四) 大学排名

大学排名的影响越来越大, 公共舆论的力量无处不在。早先大学排名仅限于美国, 最近几年大学排名表成倍增长, 今天已有 35 个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榜上有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已经成为国家对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化身。从普遍意义上说, 评价高等院校能够刺激高校采取行动措施以便提升大学排名的强烈动机。^[38]

我们还得充分认识到其方法的局限性。不可否认的是, 大学排名往往能提供给公众有用的教育信息, 特别是在缺乏正规质量保障体系的国家。例如, 波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向市场经济转型, 急需了解私立高校质量信息。这种对信息的渴求推动了波兰杂志的所有者发起了全国第一家大学排名。同样, 多年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年度大学排名, 也起到了最基本的质量保障功能, 同时也是填补评估与认证机构的缺失。2008 年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版公布时, 法国全国教师工会秘书长抱怨说,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上比较高等院校的绩效很不公平。” 2008 年度大学排名公布后几天, 法国高等教育部部长宣布“这些大学排名的赢家可能不是最理想的, 但它们确实存在……这表明法国大学改革的紧迫性”。^[39]

有些大学排名还把学生参与调查、劳动力市场观测信息作为关键指标。例如, 智利最重要的周刊《怎么回事》(QUE PASA) 采用未来劳工观测数据, 用每年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果对大学及专业进行排名。同样, 保加利亚教育部已经制定了一个包括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果的大学排名。

各种利益相关者并未忽略各种大学排名表以及大学排名本身的泛滥, 他们的反应并非正面的。这样的大学排名也往往被许多评论家联合否认, 因为出现了数据不真实、方法有缺陷等问题。一些大学对于其大学排名结果愤怒地抵制, 被政治对手作为一种便利的方式批评政府。^[40] 大学排名的泛滥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些人否定大学排名原则、批评大学排名的方法、抗议、政治施压, 甚至动用法律行为阻止其出版。

尽管多次试图联合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和《麦克林大学排名》, 美国与加拿大的大学排名照样公布, 其结果仍然受到学生与家长的欢迎, 因为这有助于他们

选择大学、学院与专业。

（五）基准评估

基准评估是一个大学专业与高等院校绩效与其他同等情况比较的过程。这是一个比大学排名更有意义的选择。^[41] 不仅仅是安排一个大学排名顺序，基准评估使得用户可以采用一系列性能指标比较几个专业或学校，而不是依赖大学排名顺序号码在同类高校之间指定谁是“最好”。不同的大学排名往往导致各高校争先恐后实现“金榜题名”，而基准评估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温和的基本性能的评价。

德国高等教育中心（CHE）是基准评估最全面的案例，尽管人们经常提到德国高等教育中心网站德国大学排名的错误信息。德国高等教育中心大量投入指标、过程与结果，包括学生与雇主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把高校分为三大类型：25% 领头羊院校、50% 中间院校、25% 垫底院校。用户可以选择他们想了解的大学与指标，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更精细的搜索。

基准评估近几年也进入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2007年9月，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与美国州立大学与赠地学院协会（NASULGC）宣布，他们将通过一个自愿专业问责系统公布关键绩效指标。该计划是对前面提到的斯佩林斯委员会报告关于威胁与建议的积极反应。根据这两个协会发布的计划，参与大学将使用一个通用模板，称为大学肖像，公布其成本、转学率、毕业率以及学生满意度等关键数据。该计划还将包括采用一个现有学生学习评价测试。此建议的赞助者与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者是同一位大学校长。^[42]

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国情咨文演讲》中呼吁问责制的变革，包括获得联邦资助标准下学生学费负担能力与学习成果的基准评估。2014年初，参议院提出《2014年大学学费与创新法》。法案建议成立一个由学生、学者与教育者共同组成的独立委员会，使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能够承担大学最低的学费标准，增加更多的教育增值。即使问责网站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众多反对，看来奥巴马政府仍然在鼓足风帆地推进此项目。

五、结论

回顾国际视野下质量保障发展的最新趋势，揭示了几个重要的方面。虽然建立国家质量保障结构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每年都可看所有国家政府都热衷于质量保障运动，然而很难辨别国家政府与质量保障机构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呈现出某种统一的大趋势。本论文对全世界各国的实例分析喜忧参半，一些国家加强了政府监督的作用，可能冒着政府损害质量保障机构履行独立性的风险，另外一些国家给予质量保障机构、高等院校更多的自主权，还有一些国家正在进行重大的结构变革以达到提高其质量保障体系有效性的目的。^[43]

同时，最近几年新式的问责机制已经出现，补充传统的质量保障机构评估与认证

的功能。学生参与调查、学习结果评价、劳动力市场观测、大学排名与用于基准测试的绩效指标等都可以为质量保障提供有用的附加信息。问责制的多样性为学生、雇主、政府与社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透明的高等院校运行范式。这也为质量保障机构采用一种更全面的方法实现其质量提高的使命提供了机会。根据本论文的分析，可以提出有效问责的以下 3 个原则。

首先，政府与质量保障机构必须在问责性与独立性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明确双方参与的界限与双方协商的规则。政府，广义上说是社会，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在私立教育提供者、跨国界教育成倍增加的国家，质量保障机构必须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来履行其职责。双方都应该避免走极端。政府不应让政治与缺乏信任的态度使质量保障机构蒙羞，而质量保障机构对于低于标准的高等院校不能手软，对于创新型高校不能太硬。

其次，为了达成有意义的差异性，质量保障不应主要聚焦于高等院校的运作方式，而是聚焦其实现教育的真正结果。根据 2005 年斯坦（Stein）提出的差异性理论，程序性问责主要关注的是规则与程序，与实质性问责相比意义不大；实质性问责主要关注高等院校的研究、教学与学习本身。第一种问责可能更容易监督，但毫无疑问第二种问责重点更强，其复杂性与困难度更高，涉及到学生习得能力、学生的学习成果与教育增值等方面的评价。

最后，最有效的问责机制是质量保障机构与高等院校之间的相互协商契定。协议能够确保评价过程中更大范围的问责，使得质量保障工具得到全面使用。

授权声明：本论文由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授权予云南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张建新完成。所有英文版权属于 CHEA，云南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不属于 CHEA 的附属机构，未曾得到 CHEA 的认证。——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主席朱迪思·伊顿（Judith Eaton）于 2015 年 2 月 9 日。

注释：

[1] 译者注：“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监视着你吗？）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经典句子。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老大哥”领袖同志，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你，包括你的任何动作、表情，绝对逃不过电幕的监视，甚至你的思想也不例外。

[2] Barber, M., Donnelly, K., and S. Rizvi (2013). An Avalanche is Com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evolution Ahead. Londres: IPPR. [http://med.stanford.edu/smili/support/FINAL%20Avalanche%20Paper%20110313%20\(2\).pdf](http://med.stanford.edu/smili/support/FINAL%20Avalanche%20Paper%20110313%20(2).pdf).

[3][41] Salmi, J. (2013). “If Ranking is the Disease, is Benchmarking the Cure?” In Marope, P.T.M., Wells, P. J. and E. Hazelkorn (eds). Rankings and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Uses and Misuses. Paris: UNESCO,

- pp. 235-256.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07/220789e.pdf>.
- [4] Miller, R. (2013). "Rising Tuition and Student Debt, Uncertain Job Opportunities: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hallenging Financial Times." Needham: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 [5] EUA (2013). EUA's Public Funding Observatory (Spring 2013). http://www.eua.be/Libraries/Governance_Autonomy_Funding/EUA_PFO_report_2013.sflb.ashx.
- [6] Van Damme, D. (2002). "Trends and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Relation to Trade in Education Servi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OECD/US Forum on Trade in Educational Services. Washington DC.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kills-beyond-school/2088479.pdf>.
- [7] Jongsma, A. (2014).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Space Another Step Closer." University World News. 26 September 2014. Issue No 336.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925091428577&query=African+higher+education+space+another+step+closer>.
- [8] Wells, P. (2014). The DNA of a Converging Diversity: Regional Approaches to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CHEA.
- [9] UNESCO and OECD (2005). Guidelines for Quality Provision in Cross-Border Education. Paris: UNESCO.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guidelines_E.indd.pdf
- [10] CHEA and UNESCO (2009). Toward Effective Practice: Discouraging Degree Mills in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and Paris: CHEA and UNESCO.
- [11] UNESCO (2009).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2009 World Conference. http://www.unesco.org/fileadmin/MULTIMEDIA/HQ/ED/ED/pdf/WCHE_2009/FINAL%20COMMUNIQUE%20WCHE%202009.pdf.
- [12][13] World Bank (2002). Constructing Knowledge Societies: New Challenges for Tertiary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pp.98 & 101.
- [14] OECD and the World Bank (2012). Review of Tertiary Education in Colombia. Paris and Washington DC: OECD and the World Bank.
- [15] Albania: http://www.ansamed.info/nuova_europa/en/news/countries/albania/2014/08/07/albania-closes-18-universities-for-issuing-fake-diplomas_de759b5e-1c73-4b57-9f9e-4b6805f4e802.html; Romania: <http://www.balkaninsight.com/en/article/romania-closes-four-private-universities>; Ethiopia: <http://ethiopiaobservatory.com/2011/09/06/1768/>; Kenya: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10128230404414&query=shut+down>; Nigeria: http://www.aitonline.tv/post-nuc_shuts_down_nine_universities_over_illegal_licence. Philippines: <http://www.gmanetwork.com/news/story/270293/pinoyabroad/news/pinoy-hk-students-cautioned-on-closed-economics-school>.
- [16] Kim, H-S. (2011). "South Korea: Private Institutions 'Named and Shamed' ." University World News, 11 September 2011. Issue No 188.
- [17] Tan, E. (2014). "Loan Defaulters Barred from Leaving" . University World News. 24 October 2014. Issue No. 340.
- [18] Field, K. (2013). "Senators Say Accreditors are Ineffective and Beset by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3 December 2013.
- [19] Myklebust, J. P. (2012). "Quality Assurance Regime Fails to Meet European Standards." University World News. 06 May 2012 Issue No 220.
- [20] Pain, E (2013). "New French Science Law Falls Short of Expectations." Science. 22 March 2013. <http://news.sciencemag.org/people-events/2013/03/new-french-science-law-falls-short-expectations>.

- [21] Salmi, J., and A. M. Hauptman (2006). “Innovations in Tertiary Education Financing: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Allocation Mechanism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Educ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4. September 2006.
- [22] College Productivity (2012). “Tracking Momentum” . December 2012, Edition 10.
- [23] Hare, J. (2014). “Costs Shift to Students in Australia” . The Australian, Reproduced in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14 May 2014.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4/05/14/new-federal-budget-australia-lets-universities-raise-fees-and-pulls-back-loans>.
- [24] Grove, J. (2014). “QAA ‘no Match’ for Rapid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9 October 2014.
- [25] Narayan, K. and Sharma. Y (2014). “Battle over Four-year Degrees Hits IITs and Privates” . University World News. 28 August 2014, Issue No. 332.<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828091614324>.
- [26] Maslen, G. (2013). “Red Tape Strangling Universities Must be Cut – Report” . University World News. Issue No. 283, 16 August 2013.
- [27] Williams, P. (2008).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CHEA Conference. Available at http://www.chea.org/pdf/2008_SW_Peter_Williams_Presentation.pdf.
- [28] Bok, D. 1990. 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ited in R. C. Richardson, Jr., K.R. Bracco, P.M. Callan, and J.E. Finney, 1998,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Balancing Institutional and Market Influences (San Jose, CA: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13.
- [29] 译者注：问责制意味着高等院校从六方面对其行动向公众做出公开的、负责任的交代：（1）证明权力得到恰当运用；（2）展示其为了实现其使命而努力奋斗；（3）详细报告其表现和业绩；（4）证明其效率和效果；（5）说明其为保障学位与服务质量所采取的措施；（6）证明其服务于公共需要的目的。——伯克（J. C. Burke）《高等教育实现问责制》（2005年）
- [30] Ramsden, P. and C. Callender (2014). “Review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Survey” . London: HEFCE.
- [31] Klemencic, M. and I. Chirikov (2014). “How do We Know the Eff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on Students? On the Use of Student Surveys” . Bucharest: Communication at the Second Bologna Researchers Conference. December 2014.
- [32] Porter, S. R. (2011) Do College Student Surveys have any Validity?”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35(1): 45–76.
- [33][40]Salmi, J. (2007). “The Growing Accountability Agenda: Progress or Mixed Blessing?” .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umber 50, Winter 2007,p.80.
- [34][38]Salmi, J., and A. Saroyan (2007). “League Tables as Policy Instruments: Uses and Misuses.”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Volume 19, No. 2. OECD, Paris.
- [35] NACIQI -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grity (2007). “Secretary Spellings Encourages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t National Accreditation Meeting.”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8. Washington DC: NACIQI.
- [36] OECD (2013). 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AHELO: Feasibility Study Report Volume 3 Further Insights. Paris: OECD. <http://www.oecd.org/edu/skills-beyond-school/AHELOFSReportVolume3.pdf>.
- [37] Fain, P. (2014). “Standardized Tests for the Job Market” .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14 November 2014.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4/11/14/indian-companys-skills-test-college-graduates>.

[39] Floc'h, B. (2008). "Pauvres Universités Françaises..." Le Monde. 6 August 2008.

[42] Fischer, K. 2008. "Public Colleges Release Plan to Measure their Performanc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ly 13, 2007.

[43] 译者注：美国国家教育部未来高等教育委员会在2006年9月份发布的年度报告中采用了伯克的内责制三角模型：（1）政治优先权的政治问责；（2）学术关注的专业问责；（3）市场力量的市场问责。

作者简介：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前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项目协调员，全球高等教育专家

译者简介：张建新，云南省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外事首席专家，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国际质量组（CIQG）咨询委员，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组织（APQN）理事会理事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研究项目“MOOC时代下云南高职院校网络教学资源建设、运行机制与共享策略研究”（项目编号：GZZD2014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 纾

责任校对：王春春
